

Liya Yu

致我的“身份姐妹”

一封德国的幸存信

献给 Solongo

姐妹，我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又在德国重聚，你在慕尼黑的石子路上，而我则身处柏林的街头？这一切是否恍若昨日，我们曾手挽手在骄阳下的纽约沿着阿姆斯特丹大道徜徉，步履格外轻快而自豪——身子朝着社会研究新学院的方向走去，但内心深处却向德国竖起了中指？

终日问我们究竟来自何处的德国人，这中指献给你们。你们总是疲于发问：缘何我们的德语如此流利？我们究竟喝不喝牛奶、吃不吃黑麦面包？我们是否领略过鲑鱼卷的滋味，又可曾一睹汉娜·阿伦特或是克莱斯特的文采？那些方才仍因眯缝眼而斥责我们将毁掉德国，后一秒却向我们眨眼轻语的德国人，这中指献给你们。你们侧身呢喃道：我们其实是甜美的亚洲妞，无知地置身于一堂正式的研讨课中，抑或怯坐于严肃的谈判桌旁。在你们的奚落后，我们必将无力地尝试着将这耳语夹带的气息抖落身体，就如同抖去疯狗的咬伤一般。紧接着，我们在浴室光滑的地砖上彻底崩溃，然而房门必须上锁紧闭——只有这样，那为了更好的生活而疲于奔命、甚至不惜磨去最后一层皮的母亲们才能对我们的困窘一无所知。

但在有了美国的博士论文和全额奖学金，并成功将家搬至纽约之后，我们终于得以欢庆这狗屎般遭遇的结束。如同降生于德国之前如梦般的初始状态，我们如今可以变得一身轻松、近乎透明，同时也让真我在这世间时刻为人所见。在纽约，我们无需不断地解释，也不再必须为自己的存在而道歉。我们的声音重回我们的声音，手臂也仍是人类的手臂，头发仅仅是一簇角蛋白纤维，无论何种肤色或是发色，它都和阿姆斯特丹大道上存在于每一个头顶的根本结构毫无差异。

我犹记得第一次的照面，两人在上东区讨论着彼此身体的经验，你身穿一件丝绸般柔滑的无袖上衣，专注而笔直地站在吧台旁，上臂那精致的亚洲皮肤反射着夏日傍晚的余晖。那时我心想，你是如此的美，你的面容和那笔挺身姿又是如此的德意志。

“不知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当你从德国的飞机上下来并抵达 JFK 机场，肺一下子张开了，呼吸变得更为悠长...”，你略微迟疑地开始问道。“...而一个小时后，你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因为已不再需要和在德国一样，重复地审

视和质问自己异国的身躯；因为身体的差异已不再总是成为可供每一个自以为是的公务员或是鱼肉商贩，每一个女商场销售或是骑自行车的人评论和批判的焦点；因为这里的人们懂得，我将对这样的评论感到多么气馁；因为在这里有更多的空间，去当一个简单的人？”我激动地跟着结束了你的发问，上气不接下气。

我们的友情便发端于此，这美国土地上滑稽的德国友情。我们曾一起嘲笑过德国“白左”，他们终日幻想着进步，却无法想象作为中国或是蒙古裔德国人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直面历史的反思中懂得些什么——他们援引欧洲哲学家巨擘时那炯炯的目光，在我们的双眸中却颓然黯淡下去，因为我们的躯体与这书封格格不入，因为这原不是我们的历史；因为这德国的20世纪历史本也不可能与我们相关，更因为在这德国的历史理解中，并没有留存给我们的记忆之地。

“你可否还记得，那位柏林工业大学的女士，以及她那可笑的汉娜·阿伦特评语，”我咯咯对你笑着，并没有说话。你挽起了我的手臂，并毅然将我拉上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台阶。我知道你本想说什么：看，我们现正追寻着阿伦特在纽约的踪迹，正沿着她当年逃离欧洲的路线前行——多么讽刺。我们交换了眼神，这近乎虚幻的生活所内含的反讽意味一下子变得确切起来。它再也不像彼时一般，仅是从指缝间匆匆掠去。

身处纽约的我们，同时变得愈发像中国和蒙古人。但始料未及的是，我们也变得更为德国。我可以轻松地发掘和享受我拥有的中国身份，而你则对流淌在身体里的蒙古血液更为熟悉。我们无需害怕会像在德国一样遭人怀疑——背弃德国的身份，混淆德国的文化，污染德国的语言——或者为人控诉，德国会因我们体内的另一种认同而被破坏并衰亡。带着身上共存的两种文化认同，我们的日常生活突然间不再是持久的犯罪，也不再是德国精神对我们不断的拷问听证：

“你在何处、
何时、
和身上的哪一位、
于何地
对我们隐瞒了些什么
你究竟是谁
你究竟——到底
对这个德国爱得够不够深？”

然而可悲的笑话是，在纽约的我们思念德国。这种思念带着某种感性与烈度，让我十分惊愕。我们怀念德国的严谨以及它对轻浮的拒斥：在纽约的学者和学术圈子里常弥漫着惺惺作态的气氛，我们对此头疼不已。“同学们，成熟点”，这样的念想常常闪过我的脑中。

但我们双方对这种思念都闭口不谈，或许是因为好不容易赢得的新生活太过脆弱。然而，当我看到你在布鲁克林合租公寓的厨房里为大家烹饪柯尼斯堡肉丸（Königsberger Klopse）时，这种思念就已然不言而喻。你还不忘在给我上菜时抛给我一个会意的微笑，用我们特有的自我嘲讽和夸张的愤懑语调高喊道：“在德国可不是这么做这道菜的！”当看到有德国艺术家或是作者在纽约办展抑或读书会时，我们陷入的那种激动，也让思念溢于言表。我们在每次见面时总是勤奋地编织语言之茧，用文字游戏维持德国的认同。

因为在德国等着我们的绝不是富足的中产阶级家庭——他们可以将我们童年与少年的时光保存在玛瑙护身符中，并在我们归国之时将之取出，展示于众人。与之相反，正如大多数第一代艰苦移民的孩子一样，我们教会了父母德国的意义，将童年与青春年少时期的自我悄悄地穿戴在自己的脖子上，就如同一枚偶然捡到的浮雕垂饰。每当我与你交谈之时，它便真实起来，而当你在生活中缺席之时，它便失去光彩。

那是一个对十月而言很不寻常的湿热日子，我们在中央公园慢跑。你突然在一条公园长椅前停下脚步，并近乎恼怒地呼喊道：“今天是德国统一日！”天气格外炎热，汗水从背上淌下，我们不得不坐下来休憩。在这条长椅上，我们第一次互相倾诉家庭的故事：你的从东德开始，而我则是西德。

“在柏林墙倒塌前，你们在哪里？”我问你。你紧闭双眼，只简短地回答道：“你们运气够好，可以在西边开始新的生活。”

你的父母从蒙古来到东德，父亲是一名工程师、一位学者，也是一个充满魅力的人物。他走的太早，在柏林墙倒塌之后不久便不幸去世。你的母亲不得不在普劳恩（Plauen）担负起养育你和你姐妹的重任。东德的一切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你对那种失望、荒废感的理解，你对东西两个政权的愤怒，以及对西德傲慢与纡尊的不满，都深入骨髓。在女同学家中，你曾惊恐地睁大双眼，看着她的父亲将纳粹万字收藏从玻璃柜中取出。

对于你的家庭而言，柏林墙的倒塌，也意味着一个世界的坍塌。正因为你们的故事从东德开始，你们也因此承担了作为外国和东德人的双重压力。

当我和母亲在我两岁那年抵达东柏林的舍内菲尔德机场时，柏林墙仍旧矗立。从西柏林开车到舍内菲尔德来接我们的父亲，因为停车问题被一名民主德国的警官拦下。我们无助地等待着他。母亲最后决定，乘坐最后一班夜间巴士前往西柏林。她意志坚决，在德国的第一晚决不能在东德度过。

此后，我的姐妹，当我们互相熟悉之时，亦即对彼此的弱点都无需多言便心领神会时，你将我从另一次崩溃中拯救出来。为了逃离外面的暴风雪，我们站在喜爱的上东区大都会博物馆里，驻足于安塞姆·基弗的大型油画《海边的波西米亚（Böhmen liegt am Meer）》前。

无穷尽的虞美人海洋充满了基弗的油画，一条孤寂的路通向天际，通向虚无。在地平线的上方，用我在巴伐利亚学过的入门标准拉丁字母书写着孩童般的字迹：“海边的波西米亚”。这是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的诗句，描述了战争的摧残和战后的荒废，表达乌托邦失落的同时也吐露了对它的希冀，是对人类规则全部破坏之后全新开始的憧憬。我一直以来都这么理解这幅油画，这也是它本来的意义。

然而，当我在这大幅画布上看到如此孩童般的字迹时，眼中突然流下了泪水——这可能也是我的笔触啊。海边的波西米亚讲述了不可能的故事，波西米亚被陆地包围，根本不可能临海，无论人们是多么向往和希望这是真的都无济于事。我突然意识到，这句话和这幅画描绘的恰是我们和德国与德国性的关系。为什么我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德国是我们内心归属之地，却也不断从我们身边抽离。每一次的尝试都注定失败而可笑。我们的德国身份是讽刺的笑话，在这画廊的寂静之中，我或许是笑的最响亮和用劲的那一个。我们从不希望真的被视作德国人，我们永远不可能属于德国。海边的波西米亚，这或许是我们乌托邦式的疯狂尝试：试着将我们与父母辈的德国故事，我们的德国自画像和政治意义上的国籍，和某种永远不可能存在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相适应。我的泪水于是从绝望之泪变成了无尽愤怒之泪，这种怒火甚至可以驱使我将整幅画从墙上撕下来。

在这整个过程中，你都静静地站在我身旁，锐利的眼神直视前方。我松了一口气，你或许没有看到我的泪水。然而，你之后靠向了我，并向左耳细

语道：“你还记得吗，当我们还是德国高中毕业生的时候曾认为，英格伯格·巴赫曼是上个世纪最重要的女诗人，而德国文化必是世界之脐？这里没有人认识巴赫曼。亲爱的，世界总是更为宽广。”你向我眨了眨眼，说道，“来，让我们去拜占庭展厅吧。”

这是我对你在纽约最后的印象。你的声音留存在我的耳中，尝试着让我免受自己的戕害。我想象着你现在会如何在慕尼黑的街道上行走，带着你常有的优雅和仪态，踩着匆匆的步伐。然而，你的画面逐渐模糊，已无法聚焦。原因是否在于，回到德国的这幅身躯，已然不是原来的身体？为什么对我们而言，保持一如既往如此艰难？为什么对我们而言，一切最后又都稍纵即逝？

我只知道，在仍拥有女孩身躯之时，我们便离开了德国，而如今，我们以女人的身份回归故里。和十年前断然离开此处的情况并无不同，我们亚洲、女性的身体依然会引起人群不适的反应，而现在拥有全新自信的我们，甚至会遭受更多的睥睨。在回来之后，我们的身体在这德国土地上再一次变得不踏实而尴尬，蜷缩在日常的注视和质问之下。我们不得不因为自己的不同而不断克制、解释、自卫或是道歉，为了人际关系中最基础的尊重和舒适而做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缕头发已不再仅仅是头发，一只手臂也不再仅是手臂。

啊，姐妹，我们究竟是不是太傻才决定回到德国，回到这个贼窝。终有一天，我们每日对自我存在的省思会掠走最后理智的残存。为什么在果断地划清界限、勇敢地竖起中指并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之后，依旧选择回来？我们重新获得的人性曾萌发于充满活力的美国后民权讨论中，此后尽管有特朗普，仍得以在美国蓬勃发展。而如今在德国，我们是否正要失去这赢得的一切？姐妹，对你我而言，究竟是什么危在旦夕——毋宁说，我们到头来已输掉了这一局？

我又一次在耳中听到了你的声音。我开始思考世界的广度，思索身处于多瑙河和施普雷河中间的我们，存在的余地是多么的狭小。一阵高潮开始在我身上涌动，它首先触及了我的脚底，而后猛地上升，抵达颅腔后又穿过大脑。这是冗余的涌潮——现实的冗余，自我存在的冗余——这是德国土地上中国双足的原子过量，是在这分化、割裂到令人眩晕的世界中，我泛性大脑的神经过剩。

在我面前，一张朴素的图像开始现身，由简单的笔触构成。我看到了它并意识到，我们并没有输掉这场游戏。我们不再是孩童，也并非以孩子的身份回到这里。关于自己究竟是谁的长久斗争最终会逼迫我们将所有自我的现实一层层剥去，直到露出血与骨。这场斗争早在十年前决定离开德国之时就已打响。我们通过友情找回了自我，也在四处寻觅那从指间滑走的物事中夺回了真实——它终究没有消逝于沙尘。

姐妹，我是多么由衷地感激，你将阴森的魔法和骇人的咒语从我的人生道路上祛除，让我能够一个人沿着阿姆斯特丹大道向下走去，让我的身体能够感知这一切。

作为移民，我们也有重新定义自我的自由，德国再也不能决定我们是谁。这次归国并非强迫，不是又一次的逃离，也绝不是什么让自我存在胡乱为人刀俎的卖身契。我们不再是笑话，或许从来也不曾是——因为嘲笑幸存之人，并非易事。

赫尔辛基，2019年3-4月

翻译：Runzhi Lou